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入选图书
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丛

夏春涛 主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哲学基础

李景源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入选图书
新闻出版总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重点出版物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李景源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 李景源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丛)
ISBN 978 - 7 - 5650 - 0727 - 9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5353 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李景源 著

责任编辑	李克明 章建
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30009)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电 话	总 编 室: 0551—2903038 市场营销部: 0551—2903198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0 - 0727 - 9
定 价	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景源，1945年7月生，天津宝坻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2年定为助理研究员，1988年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7月晋升研究员职称，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2008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哲学学部副主任；《哲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代表性成果有：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此书先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推动哲学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卷），论文《关于唯物史观与价值观关系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主编《中国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总 序

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豪情奔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征程之际，我们郑重推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丛》。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奋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谱写了历史新篇，迎来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这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一段荡气回肠振奋人心的历史。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新时期历史的关键词。

走出这条新路着实不易，是历经艰辛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先导；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30 多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因此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正确的行动指南。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新思想新论点时下已成为共识或常识，但当初理论创新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都会遇

到不同声音的干扰。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同样不容易，仍会遇到新问题新风险、经受新考验新挑战，需要进行新思考新探索新实践。编辑这套《文丛》，目的是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深化认识、促进思考，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

首批《文丛》共收入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术背景的六位学者的文集。各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尽相同，这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每本文集的字数均控制在20万字左右，便于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精选，不追求书的厚度。我们的编辑思路，是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着重编选那些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析，对前沿性战略性全局性课题进行思考的文章，进而从一个侧面展现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着重编选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讲真话讲实话讲出新话，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至于我们的初衷能否实现，实际效果如何，有待读者朋友来评判。倘若这套《文丛》能引发更多的人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我们将倍感欣慰。

自序

书中的18篇文章是从以往发表的成果中选出来的，选择的角
度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基础这一主题关联比较紧密的文章。
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方面的，
一类是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方面的，
再有一类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上述文章多数是“遵命
文学”，即应邀参加各种理论研讨会和理论讲座而写的。从90年代
以后，尤其是我从1993年底担任哲学所领导职务之后，虽未中断
学术思考，但管理工作的性质使我理论思考的重心无形中发生了转
移，即从论到史（从近现代哲学史到当代哲学问题）、从经典马克
思主义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使我再
次回想起当时写作的缘由和思想转变的过程，感慨系之。借本书出
版之际，谈谈多年来形成这些文字的感受，或更为适宜。

一、学术研究的背后有一种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起作用

记得考取研究生后，我曾立志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
究，以纯学术立命，不碰或少碰现实问题。但后来却一步步走上了
以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带动基本理论探讨的道路。其实，个人的想法
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变迁。时代一再要求和改变着个人的思考，这本
是理论工作者的常态，问题是能否处理好个人理论兴趣、追求与时
代要求的辩证关系。众所周知，哲学的功能在大的历史变动时期会

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抗日战争初期，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一齐转向了中国问题，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讨论的焦点是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思想不会亡。在救亡图存的激励下，各位学者奋力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哲学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改革开放伊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再次彰显了哲学是解放思想的利器这一功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自己的辉煌业绩走进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度空前提高，“中国崛起”、“中国道路”成为近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这预示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西方进行哲学对话的新时期，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西方国家最关注的是中国所秉持的价值观，他们始终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推测中国的发展。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头号强国的日子为时不远，届时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将不是我们的盟友，资本主义遇到了自两极时代以来最尖锐的意识形态危机。自从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以来，国外政要、学者对中国模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他们描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若干现象特征，却很难理解中国的发展观念的精神实质。时代的需要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代人的学术取向，西方政要对中国价值观的重大关切（如有的认为中国缺少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有的提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中国选择何种道路），日益引起国民的极大关注，“中国道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界首要的研究课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此次全球危机，是西方主导价值观的危机、哲学的危机。基辛格在不久前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论著中，突出强调了中国与美国在哲学理念方面的不同，他认为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共同的理念是两国关系中最深刻的挑战。中国哲学要关照时代的发展，面对全球化问题作出更加

自如的中国式回答，是当代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二、关于时代的主题与心中的困惑

哲学家要做时代的思考者，即时代要成为我们思考的坐标，问题是怎样走向时代的深处？我有一个很真切的体会，即关键是抓住自己心中产生的理论困惑。记得曹禺先生曾经说过，要写他的传记就是要写出他心中的苦闷。所谓“我手写我心”，就是要关注和解决心中的困惑，这恐怕是天底下想做学问的人都有的感受。上个世纪末，胡绳先生曾经写过一幅《八十自寿铭》，其中有“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的语句，他还用“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的诗句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他经过三十年的不懈探索，对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终于达到了一种豁然独醒的境界，创造了晚年的学术辉煌。冯友兰先生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1919年赴美日记中写道：新文化运动使我懂得在八股之外有真正的学问，进入一个新天地；到美国之后，又发现一个更新的天地。这两个天地是有矛盾的，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是我哲学活动的开始。1982年冯友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再次表示，我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1984年，他在《三松堂学术文集》的序言中说，从1915年至今，六十多年间，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他的多次表露说明，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冲突构成了他一生思考的主题，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成为他的“心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最贴近人心的事业，它是通过改变人心而改变世界的学问。

时代的主题、现实的问题与心中的困惑到底是什么关系，做学问为什么要抓住心中的困惑？心中的困惑往往是实践中反复出现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而又无法从原有理论中找到答案的问题，其出现也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陷入新旧思想纠结有关。每一时代的重大课题与理论家心中的困惑经常是不谋而合。在全球化时代，现实的重大问题往往都渗透着国际因素，是中国化了的全球问题，要找到中国自己的理论问题，也要关注国外在想什么，在关注中国什么，尤其要善于把国外学者心中的困惑作为我们重点关心的课题，如“中国的理论与前苏联的理论有何不同？”这就是外国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之一。解答这一疑问，可以揭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危机的秘密。1989年5月，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人的头号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是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再如“搞了市场经济，还有没有社会主义？你们靠什么战胜资本的逻辑？”也是国外学者困惑的问题。提出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就明确表示自己对中国认知陷入矛盾之中，他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捉摸不定。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生存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胡绳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我们党始终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再如“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你们还有什么？”也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国外学者总觉得我们的回答过于笼统，他们总是追问，你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21世纪的中国秉持何种价值观？这些问题既是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经济危机和西方价值观危机条件下关注的中心，也是中国哲学界应该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只有紧紧抓住

人们心中的困惑，才能与他们进行实质性对话。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一件事，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跟上时代，就要以哲学的方式对这一实践探索搞好提炼的工作，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质性内容。2004年，我曾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版本，如何自觉地将这一实践版本（新哲学的实质系统）理论化，是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任务。近年来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主要还停留于一种“中国化史”的研究，其成果尚无法进入哲学原理的层面。打外围战的多（讨论必要性、方法论的多），实质性的成果少。都知道这个问题重要，但真正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和以此为志业的人并不多，还处于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不能进入学术主流，这个问题值得思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思想性学科的属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化”的实质是理论与现实、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化”的问题才有希望。当前的问题是，在学术界对“中国化”问题本身还存在相当多的误解，有人认为“中国化”本身是伪命题，也有人认为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就是坚持特殊主义。这些认识问题不解决，中国化的问题很难深入下去。

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它涵盖中、西、马哲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从晚清的“中体西用”、中间经过“别共殊”和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论”，一直到目前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讨论可以为证。“中

国化”这个词很明确，就是把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特色”则出现了不同的理解，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个概念是脱离普遍的特殊主义和经验主义。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从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的视角来对待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一百五十多年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意思是说，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思考，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也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马克思已经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了，后来的人们又因为教条主义理解把它变为空想的了。邓小平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反复强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要符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化”和“中国特色”不时有人提出质疑，这表明在当前普及历史唯物主义有紧迫的意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具体历史实践出发的唯物主义，就是从具体条件下的事物出发的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毛泽东有很透彻的把握。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列宁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考虑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唯物史观不仅为民主革命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合理性的论证，而且为近代以来所争论的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历史观基础。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论”，其要义是既反对抽象地站在普遍主义立场，又反对抽象地站在特殊主义立场，而

主张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历史的统一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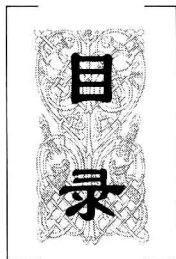
上述想法是我在回顾以往的写作时所想到的，所提出的若干问题也是我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衷心感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一个将论文结集出版的机会，感谢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志斌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的劳动。

书中观点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李景源

2012年1月18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001)

 基于实践的“古今中外法”

 ——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发展观 (023)

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成道路 (036)

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光辉典范

 ——试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 (050)

与时俱进思想的哲学基础 (068)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082)

论学风 (088)

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 (097)

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推动哲学理论创新 (107)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120)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	(125)
论文化的综合创新	(144)
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163)
唯物史观与思想路线	(179)
关于唯物史观与价值观关系的思考	(186)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195)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17)
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	(225)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

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七十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理论和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且指出了如何把普遍原理运用于特殊国情的途径和方法，为党和人民提供了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①“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命题，它高度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就其内容而言，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又是中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对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代表了中国理性思维的新发展。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程，而且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思

* 原刊《哲学研究》1991年第6期。

①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编者注：原文注释中所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邓小平文选》，选入本书时统一更改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

想保证。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而在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完整准确地把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对于搞好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实现新时期党的总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如何理解和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实际的关系问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本国革命胜利的关键环节。早在1919年，列宁就提醒东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去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遵循列宁的这一教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但在这一时期所初步形成的调查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活动相结合的风气，为我们党在后来从理论上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